

清

末

民

初

社

会

风

情

醒俗 画报

精选

侯杰 王昆江 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清末民初的社会风情

——《醒俗画报》解读

1404年，天津建城，明清时期依漕运业、盐业而发展，至近代进入了黄金时期。1860年开埠后，天津一跃而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以及天津教案、老西开事件等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或历史事件，均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甚至就发生在天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变化，一股社会风俗的变革浪潮也在酝酿、兴起，并在社会中传播开去，成为这座城市突出的特色。

沿着海河修建起来的九国租界，成为西方文化的大展台。洋房豪宅鳞次栉比，马路电灯竞相出现，洋火、洋布、洋烟、洋酒、洋车等各种新奇玩意儿，率先成为富豪大贾显示身份的必备品和享乐生活的奢侈品。洋行、银行相继设立，买办们的生活方式日益欧化，不仅戴礼帽，打领带，拄手杖，出入西装革履，而且说外语，上洋学，去教堂，开party，打网球或者是高尔夫球。电影院、舞厅、音乐厅、酒吧成为有钱华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然而这一时期西俗东渐的影响范围还是有限的，传统习俗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市民们依然习惯于在忙碌一天之后跑到茶楼、戏馆听听段子，捧捧角儿；为了洽谈生意，商人们也大都到饭庄、妓院去消遣，联络一下感情；普通人家遇上灾病，总是想找个巫婆、神汉来瞧瞧，看是否有邪魔附体；婚丧嫁娶也大都率由旧章，批八字、选吉时、拜天地仍是必不可少的步骤；磕头、拜年、赶庙会，还是年节习俗中的重要内容。

洋务运动以后，先后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袁世凯等重臣显官以天津为主要基地，大力推行新政。天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呈现出新气象。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学校聚集了经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白话翻译家伍光建等人，培养了黎元洪、张伯苓等人才。北洋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南开学校更是私立学堂的典范，相继造就出一大批现代化人才。北洋女子公学、普育女学等由女子主办的学校使女子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为争取男女平等做出了切实的努力。闻名全国的《国闻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成为开启民智，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英敛之热心提倡白话文，并亲自举办白话演讲，倡导剪发易服，举行新式婚礼、丧礼，主张女子放足、天足，禁止吸食鸦片，反对纳妾、蓄婢。李叔同以开追悼会的方式，寄托对母亲的哀思，对于改良丧葬习俗意义重大。马千里与张祝春通过举办新式婚礼结为伉俪，为新婚俗进入市民生活率先垂范。随着巡警的出现，一些不文明的言行受到了监督和纠正。文明之风也吹进了监狱和济良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勇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社会大舞台上各显身手。温世霖等人为清末国会请愿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功至伟。

曾几何时，中华民国的建立，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人们以为传统的风俗习惯似乎可以随着政体的更迭而湮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描写这场改天换地的社会潮流所带来的是：

共和政体兴，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兴，清朝灭；
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
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
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
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
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
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
 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
 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
 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时报》1912年3月5日）

事实上，天津社会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习俗、新风气。旧礼废除、新制建立以及毁庙兴学，给民众的生活与观念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助于社会新时尚的形成。而剪发、易服、放足、禁烟等更向纵深发展。

可是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如奢侈风气、弃婴、早婚、崇尚贞烈、降神附体、求巫疗病等仍然存在于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中。这也构成了天津乃至全国社会风俗中新旧交替、中西杂糅、传统与现代并陈的奇特景观。

为了更真实、更形象地将清末民初的天津社会风俗集中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以《醒俗画报》为投影仪，将那个时代的真实以黑白为底色一一投映出来。以画报来反映中国社会风俗习惯的变化，并不是从众与随俗，而是要了却一个宿愿。大学时代，我们曾醉心于追寻天津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渴望有一天能借助《醒俗画报》、《人镜画报》、《北洋画报》等揭示近代中国特别是天津的历史变迁。对《醒俗画报》的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它的主编和制作者们对社会风俗习惯的改良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之该画报具有形象、直观等特点，文字老辣，视野开阔，较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非常引人入胜。

图文并重的阅读形式本来是古人一种理想的治学方法，正所谓“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到了近代，受西方大众传媒的影响，中国社会出现了报刊。以上海《点石斋画报》为肇始，图文并茂的画报风靡一时，颇受人们的欢迎。1909年出版的《京华百工竹枝词》中，有曰：“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毕竟，对于民智未开、识字不多的普通人来说，看着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多多少少可以了解一些社会时事新闻。于

是，在图上配以浅白通俗的文字，评说着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闻，画报一下子风行起来。它不仅收到了新闻宣传的效果，对于开启民智，更是不无裨益。天津的《醒俗画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

二

1907年3月23日，一份石印画报——《醒俗画报》在天津启文阅报社内创刊，后迁到城内鼓楼东大街。该报由普育女学创办人温世霖和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改名为南开中学）英文教习吴芷洲共同发起创办，第一任主笔为陆辛农（笔名新农、醒农、馨农、文郁），慈惠寺小学堂长张绍山负责编辑文字。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市民小报，在第二期上，报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出：“本馆同仁以唤醒国民、校正陋俗为宗旨。录事概用图说，以期人人易知易解。”《醒俗画报》本身的规模并不甚大，所以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本馆访事人员无多，如有热心志士见有关乎风俗人心等事，请函致本馆，量事酬谢”。尽管人手不多，但是对稿件的质量要求却很高，“如有不合本馆宗旨及经本馆复查不实者概不登录”。这既是醒俗报人一贯追求的目标，也赢得了读者。

《醒俗画报》的发行并不限于天津，这从该报在不同地区的发行价格中可见一斑：“本埠每月三本，铜元二十一枚。零售每本铜元七枚。外埠每月三本，大洋二角五分，全年三十五本，大洋二元五角。外国每月三本，大洋三角五分，全年三十五本，大洋三元五角。（邮费在内闰月加算）”《醒俗画报》在很多地方都设有代派处，如天津乡祠前李茂林、闻元书局、华洋书庄，北京五城学堂张黼廷君，保定唐家胡同冯霭堂君，烟台天茂栈杨墨棠君，锦州隼丰盛，山海关信成源，营口卫生局，奉天财政处，河南陆军学堂温佩珊君，湖南袁兴盛袁茂亭君，张家口下堡大亨店，济南府和记，镇江福兴润信局，上海福兴润信局，杭州福兴润信局。为了扩大报馆的收入，《醒俗画报》也刊登一些广告或声明。“凡有欲登告白者，本馆概绘图注说，价值格外从廉，如欲登者，请至本馆账房面议。”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醒俗画报》也不断地改版、调整。它在创办之初为旬刊，是不规则

32开折叠装订——每刊十幅图，二十页。自1907年7月14日出版的第十三期起，改为五日刊。

1908年5月4日，《醒俗画报》更名为《醒华画报》，每月发行九期。1908年5月间，官场上爆出“美人贿赂案”的丑闻——段芝贵以伶人杨翠喜行贿慈禧太后宠臣载振，一时间在社会中闹得沸沸扬扬。画家张瘦虎遂以“愁父”为笔名，做讽刺画《升官图》投给《醒华画报》。因其幅巨大，特摹而印之。就在温世霖等人准备发行之际，却遭吴芷洲反对。温世霖与陆辛农愤而离去，与顾叔度另组织出版《人镜画报》，《醒华画报》改由陈恭甫接办。5月16日，该刊增发双日刊《醒华日报》，后改为日刊。10月30日，报馆迁至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1910年8月，《醒华画报》与《醒华日报》合并，每月由发行九期改为十五期，逢双日出版。

到1912年，《醒华画报》的日发行量达到1200份，在社会上拥有了一定的读者群。据考证，《醒华画报》大约于1913年1月（一六一八期）停刊。

为避免混淆，本书采用它最初使用的名字《醒俗画报》称谓这一系列报纸。

这份在天津存在了大约六年的画报，虽然出版时间不算太长，但却见证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巨变——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作为社会变迁的记录者和引领者之一，《醒俗画报》的内容极为丰富，从记录时事到针砭时弊，从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到介绍新奇事物及其变化，从阐释风俗含义到批判陈规陋习，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清末民初天津乃至中国各地社会生活的一幕幕鲜活场景。虽然从绘画技巧和画面的精美程度看，《醒俗画报》可能与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略有差距，但是那入木三分、犀利精辟的点评之语却是其他画报难以望其项背的。尤其是它对官场弊端的猛烈抨击，更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这足以改变某些人的观点即“靠近统治中心的北方报业则较为谨慎或保守，即便是形式活泼的画报，也大多画一些政治性较弱的中外历史人物”（杨炳延主编：《旧京醒世画报·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实事求是地说，这也成为该画报的亮点

之一。

《醒俗画报》无疑是一个难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库，凝聚了报人们的心血与智慧。翻看着那一张又一张泛黄的浸透着历史沧桑的画报，报人们那份对生命的执著、对生活的希冀、对未来的热情、对社会的悲情、对民众的担忧，浸透其中，清晰可见。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有识之士都心怀“救亡图存”的宏愿，对各种社会弊端口诛笔伐，而这正反映出报人们“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国热忱。另外，从画报的名称“醒俗”、“醒华”也可窥见报人们的拳拳之心。从办报者到主笔人，莫不以笔为器，以画为媒，大力提倡社会新风尚、新文明，激烈抨击社会旧风习、旧传统。报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联系社会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媒介。

三

解读《醒俗画报》，我们拟定从两个大方面来选取图文，即俗与风。而这也暗合了《醒俗画报》自身的发展历史，即从早期对民间“旧俗”的指责，到后期开始引导社会风气，抨击不文明现象。

俗，有习俗的意思。一般多是指传统的信仰、习惯、岁时年节等人们业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它们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化而被传承下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恒久性。《醒俗画报》对于旧有的中国传统习俗进行了颇为集中的剖析甚至批判。因此，我们从《醒俗画报》中选取并整理出有关年节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信仰习俗四个方面内容加以阐释。

风，是指一定时期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时尚。《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希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所谓风，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在更名为《醒华》之后，画报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追踪清末民初社会风习的演变，也不再仅仅囿于传统礼俗。报人们用慧眼去洞察官场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疾苦、社会公共组织的起伏跌宕以及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而孝道、贞节、俭朴、隐忍、宽厚、互助、慈善、文明等也受到关注。他们既想用传统儒家思想的圣人理念来恢复中国人头脑

之中的理想世界，又想引入西方的文明、进步、竞争、尚武等思想观念，以期有朝一日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因此，按照从上层官僚体制，到中层社会公共空间，再到家庭私人空间的空间结构逻辑，我们选取了如下几个方面，包括官场现形记、病态众生相、不良风习（附“元元红专题”）、文明风尚、慈善赈济、家庭关系等六个部分加以导读。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阐释与导读并非是对《醒俗画报》报人们的立场、观点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对于这些报人所揭示的社会风俗、习惯以及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再思考。反思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是对“批判的再批判”。但我们不想采用将事物一分为二的“批判”方法。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和错、进步与落后都是相对的，似乎皆是由时代的主流话语来左右和决定的。但主流话语毕竟更多地体现着一种衡量事物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是否就是“真理”，也许还需要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检验。有些论断确实值得再“批判”。

报人们在指斥中国风俗习惯中的诸多“迷信”时，本身就隐含着受到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影响。何以一些神化的事物，在西方是宗教，在中国就被视为迷信？此外，对于处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报人们来说，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未曾发现，他们在评价某些社会风俗习惯时常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在提倡社会文明时，他们会积极呼吁人们接受“新式教育”、“放足”；在强调稳定家庭秩序时，他们又提倡几近残忍的传统“孝道”、“贞节”、“节烈”等。报人们既提倡女子要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同时又反对男女社交公开，对于男女“相携过市”、“结伴长堤”和“杂沓盈座”，他们都认为是“有害风化”。可见，他们会交替使用两把不同的尺子来衡量所面对的社会事物。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清末民初报人们的身上，而且几乎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梦魇。所有这一切，都缘于他们希望通过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优良成分，去掉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糟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黑色和白色是持久不变的永恒。我们感念《醒俗画报》的报人们用简洁的黑色线条，浓缩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风俗的变迁，呈现出一段引人回味的历史。

目
录

◇逢年过节 人神同乐——年节习俗巡礼(1)

一年到头，中国人节日不断，年节习俗应运而生。五谷丰登、财源广进、升官发财、家庭和睦、人丁兴旺，凡此种种皆成为人们不懈追求与渴望获得的美好事物。有些习俗在报人眼中却成为社会文明的阻碍，受到了抨击和谴责。“移风易俗”汇成清末民初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婚姻习俗扫描(25)

结两姓之好，合两家之欢，乃中国传统婚姻之真谛。不管是定亲、迎娶，还是离婚、守节、再娶，本属男女们自己的事情，却要父母与媒妁操心。骗婚、退婚等诸多不幸稀里糊涂地就降临到当事人的头上。而文明结婚逐渐成为新婚俗，不仅礼仪由繁趋简，而且突出了人们对自由婚姻和对个人情感的追求。



◇靡费三千 往者为重——丧葬习俗透析(49)

作为人生的终点和归宿，丧葬礼仪本有使逝者安然离开芜杂尘世之意。在中国，这一礼俗却被赋予太多含义。似乎排场越大、人越悲伤就越是孝顺。为了给父母办丧事，有人卖掉了土地、房屋。一场丧事下来，往往是死者逝矣，活人穷矣。提倡新式丧俗于是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清末全国范围内的“国丧”，让人们体验到另外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



◇消灾避祸 巫风盛行——信仰习俗解码(73)

中国人注重现世人生，渴求平安。由于经济匮乏、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得人们在面对生老病死苦时，总是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祈福禳灾。巫婆神汉俨然是神的代言人，巫风盛行。人们“信巫不信医”，以至于因延误治疗而死亡的人间悲剧不断上演。要想消除人们的神秘心理，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场现形记(99)

传统社会的官场弊病根深蒂固。买官成为跻身官场的主要变通方式，贪污舞弊屡见不鲜，苛政敛财肆无忌惮，昏聩无能、五毒俱全的大小官吏比比皆是。整个官场，莫不以聚敛钱财、欺压百姓为能，以拍马溜须、假公济私为要。几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人们看到希望。这也成为画报中不吝宣传的“真正的父母官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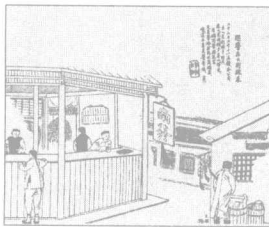
◇五毒俱全 百弊丛生——病态众生相(125)

作为社会边缘人群，瘾君子、赌徒、娼妓、土匪和骗子各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但却危害社会。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倾家荡产还算小事，有时连性命都搭了进去。不仅自己受到伤害，整个社会也被弄得乌烟瘴气。历史告诉我们的是：繁荣但不要“娼”盛，否则将大碍于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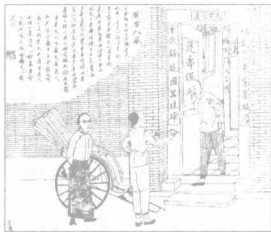
◇社会人心 两有妨害——不良风习写真(165) (附：元元红专题)

“男女授受不亲”是古老的性别规范，但在清末民初却受到了挑战，女子观戏、唱戏已不是新鲜事。可女子群殴、勾肩搭背、招摇过市则让人看不惯。乞丐恶索、奢侈成风、巡警不法，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不禁感慨世风日下，亟待整饬。男艺人“元元红”与女戏迷海银桂的私情败露，引起了社会的震动。报人不吝笔墨，追踪始末，以收警世之效。



◇强国保种 开启民智——文明风尚日兴(209)

清末民初的中国虽不是一个民智大开的时代，但无疑是一个开启民智的时代。学堂、报馆、演说当之无愧地充当了传播社会文明的“急先锋”，而巡警的出现与习艺所、监狱的改良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文明的程度。“文明”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风气之开通，使文明终于有一天也成为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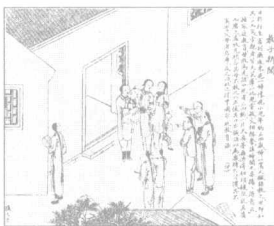
◇慈为予乐 悲为拔苦——慈善赈济真精神(237)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在战乱、灾荒频繁发生，家破人亡不断出现的动荡年代里，不管是官府出面主持慈善事业，还是民间组织自办慈善活动；也不管是为求名的善人们之献爱心，还是饱受生活折磨的娼妓、乞丐们的动真情，只要仁慈之心尚存、善良之举仍在，就应该得到肯定。他们所进行的“予乐、拔苦”诸事，也足以让为富不仁者汗颜。



◇小家庭 大天地——“围城”中的故事(255)

家庭既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又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在家庭里面发生的故事并不简单，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妻之间、妻妾之间，仿佛是一个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一个个小家庭中上演了一出出喜剧、闹剧或者悲剧。不论幸福与否，“家”都在永不休止地承载着也改变着社会习俗，向前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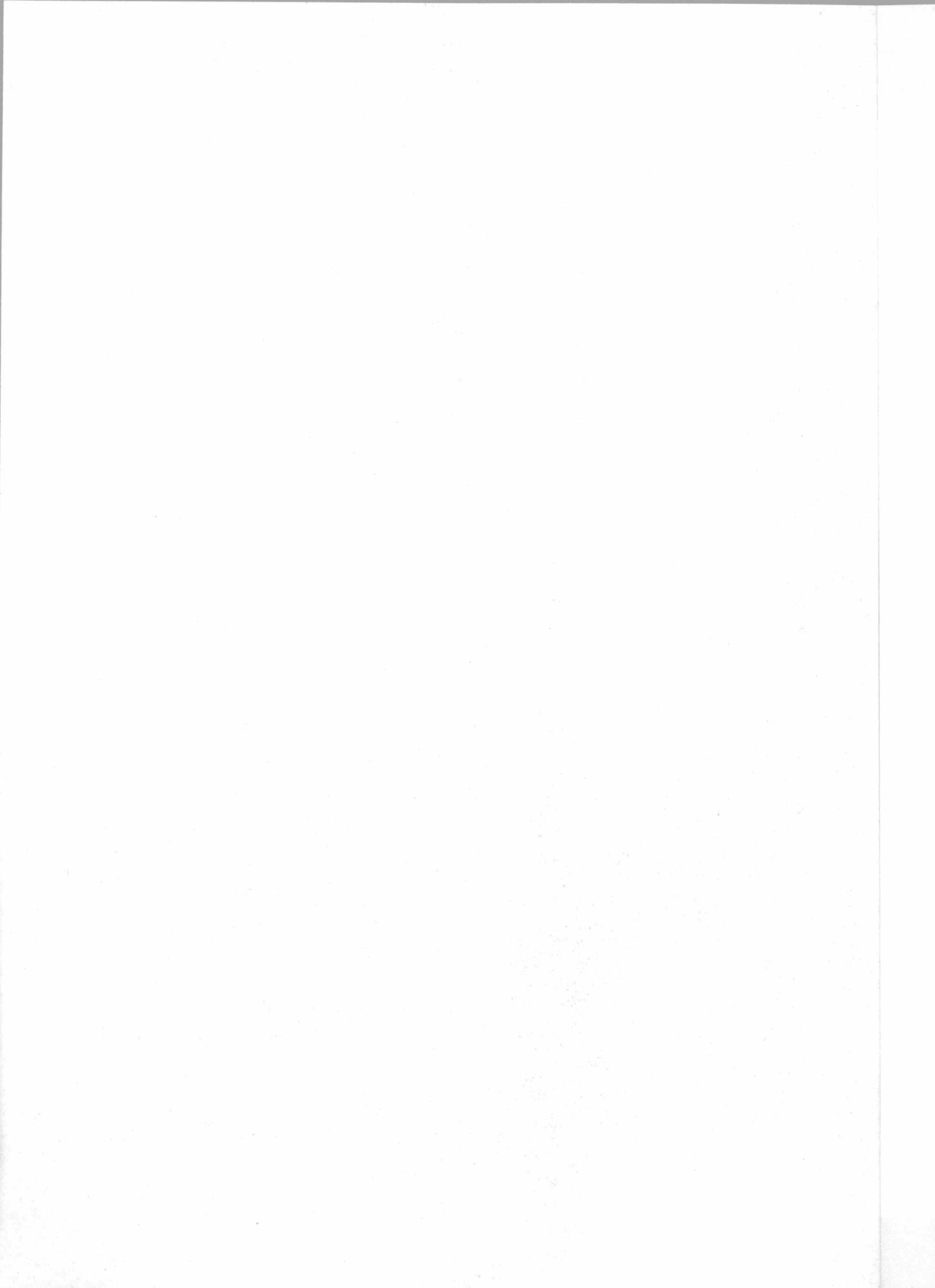
◇后 记(281)

逢年过节

人神同乐

——年节习俗巡礼





年节习俗是民间风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娱神娱人的过程中，人们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农业丰收、生活幸福的向往。或许有些年节民俗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过程，形成一系列仪式、规矩、禁忌，其中也有“断层”和“缺失”。或许今天我们仍在沿袭某种风俗习惯，但已不了解其原始意义了。比如为什么过年要在门上贴用红纸写成的对联，要燃放鞭炮，屋里面的灯光要彻夜不熄？原来都是为了把传说中的怪物“年”赶走。在近百年前，报人们对一些感到不能理解的年节习俗，提出严厉批评，强烈呼吁移风易俗。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年节习俗以及前人的评说有必要进行一番再认识。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年节习俗要数过年了。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中国“年”就拉开了序幕，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这期间说道和讲究很多。

大年三十，乃春节中特殊时刻。人们都要举行祭祀诸神和祖先的活动，感激已经获得的好收成，企盼来年风调雨顺。

正月初一，人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拜年”，既要向健在的长辈施礼，也要和亲朋好友互相祝贺。小辈要向长辈叩头，长辈给小辈“压岁钱”。古时“压岁钱”是“以彩绳串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后演变成用红纸、红绸把钱包好，置于枕下。这种习俗源于“年”的传说。传说“年”是一种怪物，走得比风还快，声大如雷，因吃人伤兽，被天神锁进深山，一年只许出山一次。可怕的是，它常出来抓小孩子回去享用。于是，人们把钱编作“龙”的形状，以吓走“年”；红色会让“年”感到像是血，因惧怕而逃逸。时光荏苒，“压岁钱”逐渐演化成为孩子祈福迎祥的方式，现在则是长辈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的一种祝福形式。

在天津，曾有正月初七吃豆腐治头疼的说法，此风俗今天已不流行。初八，吃饺子。在饺子里面包上糖果、花生、钱币等，本是为了让吃到的人能够交上好运、财运。但把钱币包在饺子中，虽说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却不符合现代卫生要求，也有一定的危险。因此，报人云：“设幼童食之，恐有误吞之害。”报人对于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几乎是事无巨细，都予以关注，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水准。

正月十五，送灯，送汤圆。即亲戚邻里之间互送灯笼、汤圆，体现着礼尚往来的原则。但这种应酬一旦严重到“一年应酬之费往往与衣食之费相等”的程度时，便加重了人们的经济负担，致使这种风俗变了味。

正月十六，走百病。在没有特定健身场所和健身方式的旧时，“走百病”是有效的全民健身方式，也为女性远足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正月廿五，填仓，也做“添仓”、“天仓”。是预演丰收之后打囤的场面，希冀粮食丰收、仓实囤满。这种习俗，随着城市的发展有所改变，像画报中提及的撒“银钱”便是由撒“谷子”演变而来，后来这一天还演变成赶集去买日用品。

二月初一，太阳生日。日神崇拜是古老的自然崇拜之一，人们相信，太阳具有促使作物成长的力量。祭祀太阳时，要做“太阳糕”，“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冠以寸余小鸡”。或许这是因为人们容易把报晓的雄鸡和太阳联系起来。还要喝“中和酒”，入太阳庙进香。报人描绘的是普通百姓家做的“太阳糕”，用豆腐代替五层小饼，用剪纸小鸡代替面塑彩鸡。

二月初二，龙抬头。传说中，龙在冬天伏蛰，惊蛰前后结束冬眠，与百虫一样开始活动起来。人们要把象征着金银财富的龙往自己的家里引。一般是在井边打一桶水，边走边倒，一直将水洒到自家门口。而画报中的人们则不许动井水，也不准动针线，恐怕伤了龙眼、龙头。据说伤了龙眼，家里人就中不了状元——不能独占鳌头。

龙抬头之日，还有“剃头”的风俗。天津的风俗，“正月不剃头，